



经典通识讲稿

甘阳 主编

超越“新战国”

吴文藻、费孝通的中华民族理论

王铭铭 著



经典通识讲稿

甘阳 主编

超越“新战国”

吴文藻、费孝通的中华民族理论

王铭铭 著



Copyright © 2012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超越“新战国”：吴文藻、费孝通的中华民族理论 / 王铭铭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8
(经典通识讲稿)
ISBN 978-7-108-04126-5

I. ①超… II. ①王… III. ①中华民族—民族学—研究
IV. ①K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23754 号

责任编辑 张静芳

装帧设计 张红 朱丽娜

责任印制 郝德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7.25

字 数 112 千字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32.00 元

慢下来，静下来

“经典通识讲稿”总序

甘 阳

中国文化论坛在 2005 年于北京香山饭店召开的首届论坛曾以“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为主题，对我国大学本科教育的现状以及开展通识教育的可行性作了广泛的讨论。那次会上许多学者专家初步达成的共识认为，我国大学的本科教育应该大力推动通识教育的发展，而通识教育的开展则应该首先着重建设“核心课程”，特别是“中外经典文本研读”核心课程。在此共识基础上，中国文化论坛委托我从 2007 年暑期开始先后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汕头大学等合作开办了每年一次的“全国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讲习班”。讲习班的具体

方式为每次请若干资深教师细读讲解若干经典文本，每天上午授课3课时，下午授课3课时，学员除必须参加上午和下午的课程外，还要求参加至少两次小班讨论（晚上）。目前这个纯粹公益性的讲习班已经连续举办了五年，每次接受来自全国各高校的正式学员二百人，加上旁听的人数常达四百人以上，对于传播推广通识教育的理念和实践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这套丛书以讲习班部分教师的讲稿为基础，同时接受其他优秀的通识讲稿，目的即在让更多读书人分享通识教育的成果。我愿借此机会感谢这些热心通识教育事业的教师，感谢为历届讲习班提供教学场地和行政后勤支持的大学领导和同事，更要感谢参加历届讲习班的数以千计的学员。中国大学通识教育的发展有赖于大学领导、大学教师和本科生、研究生的理解与支持，幸运的是，现在这样的支持者正越来越多。

需要说明，中外经典文本细读当然不是通识教育的全部，而只是通识教育的一个部分或一个方面。我们之所以特别注重这个方面，说到底还是希望重新树立认真读书的风气。经典阅读的第一个要求是：Slow down！（“慢下来”！）而不是快餐式阅读。我相信，当今教育的最大敌人就是弥漫整个社会以至大学校园的浮躁之气和急功近利心态，而通识教育就其植根于古典

自由教育理念而言，首先必须提倡慢下来，静下来，克服现代人的浮躁气和功利心。许多历史悠久的欧美文理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之所以今天仍然要求必修古希腊文和拉丁文，并不是旨在把所有学生培养成古典学家，而是希望通过学习这些并无实用性的古典语言让学生慢下来，静下来，从而成为能自由思考的自由人。

我想对所有的大学生说：大学四年，慌什么？毛什么？急什么？慢下来，静下来，开开心心读点书！

2012 年六一儿童节

目 录

讲 稿

- 3 第一讲 吴文藻与他的《民族与国家》
- 42 第二讲 费孝通与他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

文 本

- 93 民族与国家（吴文藻）
- 124 边政学发凡（吴文藻）
- 156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费孝通）
- 217 建议阅读书目

讲 稿

本讲稿根据王铭铭先生在 2009 年 7 月中国文化论坛“第三届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讲习班”上的讲课录音整理而成。

第一讲 吴文藻与他的《民族与国家》

(一)

吴文藻这个名字，各位不一定熟悉，而对他的学生费孝通，大家肯定熟悉得多。若是细读吴文藻和费孝通的著作，你会发现，费孝通对吴文藻的“超越”，主要是经验研究上的，在观念上，却不是那么显然，在两者之间，更多是一种继承性的关系。

这两天，我们有六个小时，我会讲讲吴先生与费先生这两个人的一些共通的想法。我们可借此机会来看看两位前辈如何思考所谓“民族问题”。

(二)

为什么要谈“民族”？“民族”这两个字，对于吴文藻和费孝通到底意味着什么？费孝通的一句话，能起画龙点睛的说明作用。费先生在1989年的一个会上（21世纪婴幼儿教育与发展国际会议）作了一个报告，他的报告题目是《从小培养21世纪的人》，报告里有这样一句话：“20世纪是世界范围的战国时代。”^①这句话是我们为什么要讲“民族”的一个理由。所谓“战国时代”，对我们中国来说，就是没有大一统，诸侯自立为王，而且争着当“王中王”。每一个王都会想，我所管辖的范围是非常神圣、不容侵犯的，你若侵犯就是对我荣誉的污蔑。并且，因为是“战国”，所以王根据武力来扩张也成为正当之事。至少是从神话学的意义上，“战国”之前的天下是大家的信仰，但“战国”时，人们满足于把国家当作力量和信仰的最高单位。在天下时代，人们认为世界是由三

^① 费孝通：《从小培养21世纪的人》，见其《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168页。

个层次组成的：家，国，天下。国之外还有天下。到了战国时代，天下这个大格局就沦落了。为什么费孝通先生说 20 世纪是一个“世界范围的战国时代”呢？这当然是一种形容，不过它却是一种贴切的形容，对我们思考古今都有启发。

回过头去看，20 世纪经过了几个阶段，都跟每个民族想获得自己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有关，而且对这种主权的景仰往往导致国家之间的战争。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由盟国制定了世界秩序的纲要，欲求使之成为世界政治准则，他们在制定这个纲要的时候，强调了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由成为一个国家。可是，到 1960 年代，问题就出现了。想建立自己国家的那些民族，很多是所谓落后于欧洲和美国的殖民地。当殖民地想建立自己国家的时候，前提是要反殖民主义，这样就诞生了一些基于部落社会重组的国家。这些国家往往很难说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 1963 年的时候，人类学界和社会学界有一次紧密的合作，即人类学者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和社会学者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合著之《旧社会与新国家》，对这

个问题有所反思。^① 新国家这种东西很矛盾，一方面，所谓“后殖民的新国家”受益于西方世界秩序的基本观念；另一方面，在同一时期，“冷战”又出现了，国与国围绕着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相互有了隔阂，世界被分为两大块，红色的一块和蓝色的一块。而恰恰是这两个体系，同时在推进新国家的诞生。虽然两者的意识形态截然不同，但是前提条件是共享的。苏联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时候对马克思主义有了一个拓展。马克思主义是最先认为单单研究一个社会是不够的，还要研究不同社会构成的等级体系的这么一种理论。到了列宁的阶段，苏联理论家一方面对帝国主义的世界体系进行了有创意的阐述，另一方面又看到帝国主义留下的后患和社会主义的希望实际上是共通的。被殖民、被欺负的这些东方国家和部落社会想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对帝国主义来说，这是后患，但这恰也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希望。苏联理论家认为红色阵营可以利用东方与部落社会的建国运动来推进其事业的世界化

^① Clifford Geertz ed. , *Old Societies and New State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8.

(或今日所谓之“全球化”)，于是也采用一种把民族和国家对等看待的“民族政策”。

围绕着“民族”，以“后社会主义”、“文明冲突”、“全球化”为理论思考的方式，20世纪社会科学进入到它的最后时刻。现在西方学界时兴一个概念叫“后社会主义”，所谓“后社会主义”，实质就是要把类似于“帝国”的那个红色国际体系消解为以民族为单位的国家。“后社会主义”跟“文明冲突”论有关。刚刚过世的政治学家亨廷顿（S. P. Huntington）发展出一个关于文明冲突的理论，这个理论还是不乏一些优点的，其提出者试图基于宗教和传统来看世界秩序，而不是基于国家和大块的意识形态体系来分析世界格局。文明冲突也可以说是“后冷战”、“后社会主义”的格局，不过这种冲突不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另外，学界也出现了“全球化”概念。“全球化”的前提还是国家，疆界的被穿透，就是“全球化”。20世纪后期，我们似乎看到，“后社会主义”带来了“冷战”的结束（这当然是资本主义阵营的理想了），文明冲突的理论好像跟“冷战”结束又是一个相反的东西（与它相伴的事件很多，比如“恐怖主义”这样的概念的出现），而

“全球化”呢？其实这不过也是与“民族”和“国家”相关的“超社会运动”。

费孝通说，20 世纪是个“世界性的战国时代”，我的理解是，这个时代，以民族为单位建立国家，成为一条世界性的纲领，但矛盾的是，国与国之间的竞赛，又是这个时代的另一大特征，从一定意义上讲，所谓“冷战”、“后社会主义”、“文明冲突”、“全球化”不过是“战国式竞赛”的具体表现。于是，我以为，我们甚至可以将 20 世纪视作一个“新战国”时代。

我们讨论民族问题，理由还可以用吴文藻先生在 1942 年发表的《边政学发凡》一文来说明。这篇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

中国与西洋各国的国情不同。中国是开化最早的古国，在五千余年间，已造成了一个伟大的中华民族。中国应与整个欧洲来比，才能明了中国文化悠久的历史。中国以民族协和而统一，欧洲以民族冲突而分裂。中国政治思想，在过去可述者，例如古来华夷之辩，王霸之争；文化重于国家的观念；不勤远略，不尚武

功的信念；“以夷制夷”、“以蛮理蛮”之说；历代（特别是明清之交）的民族思想，及筹边治边的策论；清末种族革命论及大汉族主义；民元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之说。现在可述者，如西洋输入的国家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的思潮；国父手创的三民主义以及边疆民族政策的根本观念，包括最近“边疆施政纲要”所含一贯的道理；时人盛倡的大民族国家论；乃至有人主张准许蒙藏高度自治，将来在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共和国中，极为自由地位的理想；中国文化为王道文化，西方文化为霸道文化之说；万邦协和，世界大同之说。中国正统文化，爱好和平，反对侵略；民族思想，开明一贯。此种优点，值得吾人发扬而光大之。^①

把中国与整个欧洲比，这是我们今天没有胆量做的事。近代欧洲是什么？不就是罗马帝国曾经征服的“少数

^① 吴文藻：《边政学发凡》，见其《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年，273页。

民族”（如英国、法国、德国）成为在世界上占有主导地位“民族”吗？这些“民族”近代以来自视构成一个文明世界，有别于包括两河流域、印度、埃及、中国、古美洲、东南亚在内的古代文明与另外一个人口稀少、地域广阔的“板块”——“原始社会”，构成后者之文化进化的目的地，政治革新的前景，经济成长的“指标”。吴先生说，今日的中国该跟罗马帝国来比，不该跟诸如英国之类的欧洲民族来比。如果我们采纳他的看法，按照吴先生的思路来比一比，那一定会发现一个有趣的情景：中国历史似乎预示着欧洲的未来。中国的“民族”并不简单等同于国家，于是，今日中国无需建立一个像“欧盟”那样的体系，因为那样的体系我们早已有之。而这是怎么实现的？我认为，吴文藻关心的，恰是这个问题。他提供的答案是，欧洲是以武力霸道为中心观念和制度形态，而中国是讲和平的。这个呢，也许有怀疑主义心态的大家不太相信。历史上，中国打来打去的事情也很多。我们可以模仿西方人来揭露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恶”，这毫无疑问。不过，实际上吴文藻最精彩的地方不是这，而是他那拿英国殖民政策来跟中国的民族政策相比较的勇气。吴先生认为，英国殖民政策值